

于成龙的政绩

□ 石志刚

核心阅读

于成龙在广西罗城勇于任事，采取了三步走战略，被评价为“任事练达，堪列卓异”。后来每到一处为官，于成龙总会遇到新的疑难问题，他也总会迎难而上。成为直隶省最高行政长官后，面临直隶吏治松弛的问题，他又提出了整顿吏治的施政主张。于成龙在不同地方、不同职位上所干的政绩，在民间、朝廷、名臣、学者眼中皆享有盛誉。

勇于任事

1661年，45岁的于成龙，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负，赴经济落后、人烟稀少、流寇甚多的蛮荒之地——广西罗城出任知县。经友人劝阻、路途艰险、身染重病而不改初衷，等他到了罗城之后，亲眼看到年久失修的罗城县衙，茅草搭建的堂屋，没有围墙的知县住所，亲临水土不服、非常荒凉之地，这些亦动摇了于成龙的决心：“边荒久蛮之地，一官一仆，难以理事，乞赐生归。”上级没有批准于成龙乞归的请求。既然如此，他决定留在罗城大干一场，以安其心，以尽其责。

于成龙来到罗城之后，他勇于任事，采取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战略是整治匪患。罗城县当时匪患非常严重，社会治安极差。看到这个现实情况，为了加强基层管理和维护社会治安，于成龙果断地实施了保甲法这一管理制度，集中居住的居民，五家为一小保，十家为一大保，保的上一级是甲，保长和甲长对外具有防御职责，对内具有严格管理职责，层层领导、层层管理。官府再给其一定的资助。一旦有匪盗入侵，保长和甲长就会组织百姓，同仇敌忾，共同御敌。通过建立保甲制度，严禁盗贼，严惩为非作歹之徒，对于改邪归正的盗贼采取安抚政策，罗城县社会治安得到管控。

第二步是发展农业。“劝农赈贫”是知县职责之一。于成龙鼓励百姓发展农业，采取“勤而获者旌其门，惰而荒者群言以辱之”的方针。他经常走访田间地头，看到哪户的田

地经营得好，就给这户题个匾，写副对联，表彰一下，鼓励他们好好干；看到谁家的田地种得不好，就动员这家的邻居去做工作，把这家人拉到田里去干活。没过几年，罗城农业获得大丰收，百姓安居乐业。

第三步是解决讼案。罗城百姓有许多困难和纠纷，通过打官司的途径，把这些困难和纠纷反映到官府来。作为罗城的长官，他非常重视讼案。当时，罗城械斗非常厉害。由于罗城县是夷汉混居之地，县民向来争强斗狠，经常发生械斗事件。当地两大家族赵家和廖家为了争得五亩土地而发生械斗，双方各有死伤，赵家觉得吃亏了，便来县衙要求主持公道。于成龙在判语中说“械斗恶习，犯王章，伤和气，天理不容，人神共嫉”，强调了自己上任后屡屡苦口婆心告诫父老乡亲们不要械斗，但是“听之藐藐”，发生了“赵廖两姓械斗之事”，最终通过斩首赵家族长和廖家族长的方式，震慑了一批人，械斗之风从此收敛。上到重要事件，下到民情礼俗，都可以到官府申诉，于成龙都会审理，依法判决。

敢于解难

1667年，广西官府保举于成龙的批语是：“罗城在深山之间，民风强悍，成龙洁己爱民，建学宫，创养济院，任事练达，堪列卓异。”于成龙作为广西唯一“卓异”推荐给朝廷。于成龙被提拔为四川合州知州。被朝廷提拔，开启于成龙升迁之路，也开启了于成龙每到一处为官，总会遇到新的疑难问题，他也总会迎难而上踏上解决问题的新路程。



于成龙上任合州后，合州交通不便，夏天酷热难耐，民风较为彪悍。从当时合州所辖铜梁县的情况来看，能够想见于成龙治政之难。铜梁县在战争后出现了人口锐减、生产落后、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等状况，此时的官府仍然下达繁重的赋税任务，加重了百姓负担。于成龙上任后，四处张贴告示，宣传朝廷对招抚外逃流民的好政策，告诉外逃的老百姓可以随时随地回家投靠亲友、从事生产，等到生活、生产逐渐恢复、走上正轨后，再考虑合理收税。当时，许多流浪在外的老百姓在这一政策感召下回乡从事生产工作。同时，在铜梁县的流寓，即从外地逃亡到铜梁的人，于成龙按照朝廷律法，鼓励他们生产，保护其在铜梁的合法权益。于成龙再辅之以奖励垦荒、以文治民等措施，没多长时间，合州实现大治。

由于于成龙政绩卓越，被朝廷多次提拔。1678年6月，他被提拔为正三品的福建按察使，按察使的职责是“振扬风纪，澄清吏治”。于成龙的任务是负责福建全省的监察和司法管理工作。上任后的于成龙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解决关在狱中的违反“迁海令”的百姓。清朝顺治帝为了牵制和对付盘踞海外的郑成功家族的反清势力，下达了“迁海令”，这一政治主张严禁内地商船在附近海域通行，企图切断台湾的粮草来源，为最终收台奠定基础。“三藩”之乱后，靖南王耿精忠盘踞福建、虎视东南，清廷担心福建对面的台湾郑经搞反清复明，一旦和三个藩王合兵，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沿用了顺治帝的“迁海令”，通过禁止贸易，让台湾缺少粮。当时，“迁海令”非常严格，福建好多百姓因渔猎而被下狱。于成龙

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第四，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我们党所讲的政治，是坚持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为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而奋斗的政治。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始终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要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第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所讲的政治，是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奋斗的政治，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始终胸怀“为人类求解放”的崇高政治理想和高尚政治追求。我们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任何时候都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立

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我们党的根本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整顿吏治

1680年，于成龙在康熙王的保举之下，被康熙提拔为直隶巡抚，成为直隶省最高行政长官。上任后，于成龙面临直隶吏治松弛这个问题，于是提出了整顿吏治的施政主张。一方面，以小节约束官员，严禁官员之间互相送礼。当时大名县知县为试探虚实，在中秋之日，给于成龙送了一份中秋之礼。于成龙见到此物后，直接斥回，并颁布《严禁馈送檄》，对大名县知县进行严厉申飭：“本应题参，姑念初犯，暂从宽宥。”于成龙随即下令：“以后凡遇重阳、冬至、元宵灯节，并过路送礼，各衙门概行禁止。如有私相馈献，查出并行题参，决不姑宽。”

另一方面，于成龙从制度设计层面指导官员，在其颁布的《仿查劣员檄》中强调要以“察吏安民”为各级官员的职责所在。于成龙要求各级官员对勒索百姓、贪污敛财的官员要认真察察：“细加体察，务将不肖贪酷官员，据实揭报，以免枉章参处。”于成龙在直隶整顿吏治，卓有成效。

于成龙为官过程中，他在不同地方、不同职位上所干的政绩，得到了民意认可，得到了康熙认可，终于成为一代名臣。于成龙去世后，“金陵人为之巷哭”。康熙御书“高行精粹”四字为其祠额。熊赐履为其撰写墓志铭，称赞他“性善吃苦，诸人所不能堪者，他却处之如飴”。康熙评价于成龙：“两江总督于成龙操守端严，始终如一。朕巡幸江南，延访吏治，博采舆论，咸称居官清正，实天下廉吏第一。”清代学者戴震评价于成龙：“成龙清严忠直，勤劳治理事，官吏无不敬畏，归于廉慎。”在民间、朝廷、名臣、学者眼中，于成龙皆享有盛誉。



史学漫谈

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打天下，打天下的战争在于得天下、坐江山，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改朝换代。细分析起来，改朝与换代不尽相同。改朝是某个军事联盟推翻当政的统治集团，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的行为，必须通过军事较量，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流血冲突；换代则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更迭，可以是和平过渡，也可能是军事政变。

推翻旧政权的行为，在当权者看来是谋逆，必当举兵讨伐之。谋反的一方为了赢得民心，必当正乎其名，打出自己的旗号。历代通行的旗号是为民请命，替天行道。当然，这还不是“通栏大标题”，“个性化副标题”及其花样就多了。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若要面南称孤，总能找到理由。五代十国那些主儿，哪个不是如此。比方说，为迎合世人信奉正统的心理，将领军人物的家世标出来刷眼球。再比方说，为迎合世人迷信异兆的心理，附会天象或是编造梦境起事。还有些扛起替天行道大旗的队伍，或者是遭人在某个地方埋下具有符号象征性、先兆应验性物件，然后故意发掘出来示人，或者是编排几句类似谶语的童谣、民谣教人在坊间传唱等等。总之，心力前导，武力跟进，武力与心力并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当然，舆论的真伪与能量取决于这支队伍的性质和信仰，有的长期取信于民，有的只是策应一时之需，能不能达到得天下之目的，就看这支队伍的机遇、决策和能量了。秦末楚汉之争，汉末三国鏖兵，最终得天下的很难说就是得人心的军事集团。刘邦与曹操的负面评价较之对手多得多，可是历史结局又如何呢？

在我国历史的著述中，“得人心者得天下”似乎已成定论和通则。由于这一信条既是对当权者的警告，也是对民众的安慰，没人会怀疑这一信条的正确性。但当你展开历史的皱褶，细看局部那些斑斑点点，就会发现，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得人心是得天下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就是说，得人心者有望得天下，却不一定都能得天下；不得人心者很难得到天下，但不

武力与心力的较量

古代战争的基本逻辑（四）

□ 王兆贵

一定得不到天下。有些人是以血腥暴力打下江山的，有些人是靠蛊惑人心篡夺王位的，有些人是用政变阴谋登上龙椅的，他们起事之初，未必把人心看得有多重，而是找个理由，抢占先机，将天下据为己有，然后再行安民之道、利民之策，推行新政，收复人心，加固立足根基，维护自己的统治。“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但有时也诱使一干阴谋家、野心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铤而走险，逐鹿问鼎，顺昌逆亡，篡位夺权。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史，那些登上帝王宝座的，仁以兴师、德以服众者当不在少数，但也有一些黄袍加身的帝王并非先礼后兵，而是先兵后礼。“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说的也许就是这个道理。

影响战争的因素很复杂，天时、地利、人和均可细化，有利因素多且重要因素占据优势的一方往往能够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只要将影响战争的因素加以归纳和演绎，并上升到理性层面，便不难认知古代战争的基本逻辑。

也要坚决纠正政治虚无主义倾向。领导干部必须把讲政治的弦绷得紧一些、再紧一些，要牢固树立政治思维，善于从政治上把大局、看问题，善于从政治上谋划、部署、推动工作，坚定自觉把讲政治落实到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去。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忽视政治、淡化政治、削弱政治的倾向；坚决防止和克服政治警惕放松、政治标准降低、政治敏锐性迟钝、政治鉴别力削弱、政治上模糊甚至政治上糊涂等现象；坚决防止和克服政治信念动摇、政治方向走偏、政治本色丧失、政治纪律失守等情况。

讲政治是我们党管党治党、避免犯颠覆性错误的根本保证。讲政治的目的在于统一全党意志、凝聚全党力量，为实现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目标而共同奋斗。讲政治，就要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坚持不糊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着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着力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秘书长兼进修二部主任、教授〕

（上接1版）

旗帜鲜明讲政治的时代要义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这是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前提。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旗帜鲜明讲政治，就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的政治纲领、政治理论、政治方向、政治路线、政治立场和政治纪律。

第一，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我们党所讲的政治，是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政治，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社会各种力量合作协调的政治。坚持党的领导，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定海神针”，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必须牢牢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定不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决不能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决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

第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们党所讲的政治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